

命运感及自我的反对



《伐桐》
育邦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迄今为止，我读过育邦的大部分诗歌，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早期还是近期——一直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对命运的感知和思考。让人感动的是，这种感知和思考并不是基于他对自身遭际的兴叹，而是立足于“人类”这个单数的集体。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读者和写作者，倾心于艺术与自然的育邦并不沉溺于“庞大固埃”式的知识享乐。

在他刚刚出版的诗集《伐桐》中，这种沉痛的思考与强烈的命运感，仍是最能打动读者的部分。“我们有一座秘密花园/长满了命运各异的玫瑰”（《卢舍那大佛》）。在阅读这部诗集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想起西默斯·希尼的话：“诗歌也许真的是一项失落的事业。”是的，诗歌不属于那些沾沾自喜的人，不属于那些坐拥世俗王国的

成功者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明星。对于人类命运的冥思和对时代之刃的切肤之感，使育邦的诗歌面目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

基于他对存在与真理、时代与人生的认知，他使用了一种相互对立的句式来表达他的思考与感受。这一方面源于内心的犹疑与矛盾，另一方面来自他思考之后贯串着痛苦的结论。比如，在诗集的开篇之作《中年》中，他说：我有别于我自己。这句诗既反映了诗人对自己的不满，另一个角度上又是对诗歌内外的自我身份的确认，其中包含了对世俗生活中的自我的否定——“我与世界的媾和/玷污了我的日子以及从前的我。”可以想见，在他的内心深处，“从前的我”必定是纯粹的、充满了理想与朝气的，而“现在的我”则走向了内心的反面。

然而，诗人并未一味消沉下去，哪怕已被虚无感和中年的疲惫所统治，他仍然为一片树叶、一只鸽子（那些美好与充满希望的事物）而流泪，正如夕阳虽已衰老，但却拥有了更为广大的寂静。我觉得这首诗奠定了这本诗集的整体气质。

让我感兴趣的是，育邦的这种“矛盾对立”的诗歌写作法，正好对应了康德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概念，即“二律背反”。这也使育邦对他在诗中所关注的事物的思考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在我看来，育邦是一个理性或道德的悲观主义者。正像他在一首题为《挽歌》的诗中所写：“鲜花一直在撒谎/树木则保持沉默。”而“挽歌”这个词，也是进入育邦的诗歌世界的一把钥匙。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育邦会深陷在灰色的泥淖之中哀矜悲叹。在《拟古》中，育邦说：“给予失败者以永恒的奖赏。”其中的清冷与达观让闻者心喜；而对世俗生活中“失败者”的重新命

名，则体现了他迥异常俗的价值观。

在这本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出育邦诗歌同时具有两个相反相成的源头，并追认他的部分先驱。一个是自《诗经》以降，到《古诗十九首》，陶渊明，再到唐朝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中国诗歌中最天才的部分；另一个则是外国现代诗歌中似乎更为注重精神品质的几位：拉金、曼德尔斯塔姆、博尔赫斯、米沃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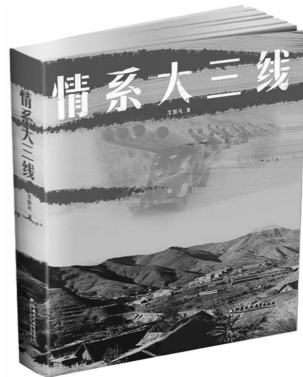
我们看到，漫游诗和与友人的酬唱之作，在诗集中占了相当的篇幅，集中收录于“青花瓷片”和“鲜花木梯”两辑中。临流赋诗，凭轩怀人，思接千古，心游万仞，大块之美与友情之醇，作为帮助诗人超脱于琐碎、庸俗的日常生存的最佳手段，在育邦这里表现得十分充分。与他的古典情怀相对，他对欧美现代派大师的海量阅读，则又使他与古代诗人判然有别。

当代生活对于人的精神的侵蚀，无不使他的诗歌具有一种质疑和抵抗的态势。现代性的苦闷，超验主义的局限，也在他的诗歌中投射出一种无力感。因此，隐喻在育邦的诗中得到大量运用：朝菌和蟋蟀、流亡的鸽子、赤裸天使、最后的晚餐……这使他的诗被赋予了一种悲壮郁勃的意味。

育邦始终关注的乃是诗歌及艺术精神，并对之怀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情感。在某个角度上，我更愿意称他是一个“自然之子”。他钟情于山水，钟情于草木，在他的诗中，从山川、江河、溪流、湖泊、森林，到每一棵梧桐、乌桕、朴树、枫杨，乃至细小到近乎无名的植物：青葙、肾蕨……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他不仅是一个荷尔德林式的精神上的还乡者，还时常畅想自己就是一个伐木丁丁的劳作者，或漂泊归来的游子与侠士。

邵风华

遥远的丰碑



《情系大三线》
沈国凡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9年10月

“大三线”主要是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十三个省区；而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在上世纪60年代，根据国际形势需要，中国提出为巩固国防而建设大三线的重要战略决策，而《情系大三线》正是一部展现这段艰苦辉煌岁月的报告文学作品。本书作者沈国凡就是这场轰轰烈烈“大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亲历者的书写是最具权威和历史价值的。

当我们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画卷，竟然在岁月的尘埃中依稀看到一座让人惊讶又陡生敬仰的丰碑。那是数十万铁道兵、铁路员工、科技工作者用青春甚至生命铸就的丰碑。全书不吝笔墨用深情的笔触讴歌了在崇山峻岭和戈壁荒野里涌现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这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一个“不愿做奴隶”的民族的记忆。

作者参加“大三线”建设的23年里，由于工作关系，接触过很多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有的就是他的领导、同事、朋友和亲人。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到的：他们平凡，像一棵小树，默默地在烈日下撑起一片绿荫；他们普通，如一棵小草，用生命默默地染绿着大地。亲切感、真实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20余年的建设岁月里，作者一直与“大三线”建设者生活战斗在一起，他善于描写小人物，而通过那些无名的“小人物”的故事，读者却看到隐藏在他们身后的“大作为”。当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等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从曾经的蛮荒之地腾空而起时，我们还能从耀眼的光芒中识别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劳动的号子吗？也许，只有在他们渐渐模糊远去的背影里，还能想起有这样一群人曾为了一个理想真的做出了感天动地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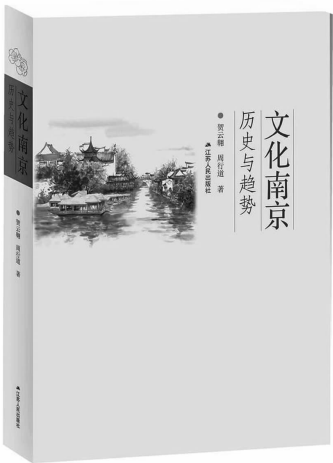
本书从作者当年一腔热血，奔赴大三线时与母亲的告别写起，以及后来到大三线后遇到的各种人和事。这些平常的生活，平常的人与事全都来自生活，就像一个老者娓娓道来的絮语，真诚、充满人生的感悟。对于不太熟悉那个年代的读者来说，大三线建设中的人物和事件才让人看得见、摸得着，更容易产生亲近感和共鸣。

全书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就是通过大三线独特的自然环境的描写，对建设者大无畏的精神和顶天立地的雄伟气魄，都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书稿中对历史地域自然的考证以及边塞古诗的把握与应用，更增添了全书的历史纵深与文化厚重。在个别地方，作者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不同场景的事件在同一章里进行跳跃式的写作，使得事件更加厚重、饱满。

直到今天，在遥远群山中的那座丰碑依然在我们心中矗立。

李明非

解读南京新力作



《文化南京：历史与趋势》
贺云翱、周行道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3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个性，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故事，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文化，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气韵。正是因为每座城市的独特性，才使得这座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风流宛然，个性昭著，八面来风，光华灿烂。不说纽约、伦敦，不说巴黎、柏林，即使在中国大陆，虽然有人担忧城市化进程中的同质化倾向，有人批评诸多城市规划的大而无当千城一面，但一座城市因其方位地域、历史人文、现实走向，还是会彰显其不愿整齐划一的大合唱，还是会表现其偶尔露峥嵘的不同流俗之处，诸如上海与北京，诸如杭州与深圳，即使同饮一江水的重庆、武汉与南京，又是有着怎样的大相径庭大异其趣啊。看过贺云翱与周行道合著的《文化南京：历史与趋势》，更是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与判断。

解读城市，阅读城市，为城市立传，在

近年来似乎成为一种风尚。四年前，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在大陆翻译出版，引来好评如潮。为人立传，古今皆然。为河流湖泊立传，也不稀奇。为城市立传，且能写出新意，令人耳目一新，就不大容易，因为多人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之内，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与独特感受，要能别开生面，另辟蹊径，道出一座城市的独特风姿，说透一座城市的魂魄奥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而在己亥年，关于南京，居然出版了两部《南京传》。一是旅居澳洲的张新奇，二是文坛名家叶兆言，这两部《南京传》虽然都面对同一座城市，却各显神通，出手不凡，双峰并峙，令人叹服。紧随其后，学者贺云翱先生穷数年之功，又在庚子之春推出《文化南京》，而他所讲述梳理的南京，不同于有些机构推出的具有集体操作工作总结性的呆板文本，不同于一些“纠集”各方人等品流不一见识多端的大杂烩急就章，他立足于自己的考古专业，凸显自己多年来关注现实城市空间研究的深厚积累，穿越古今，包举四海，有学理性的深究，有现实性的考量，有前瞻性的瞭望，成就出扎实厚重别具一格的城市传记。

贺云翱从“时间”“空间”“文化”这样的三个维度来审视解读南京，篇幅不一，各具特色，引人入胜。“时间篇”最为丰富多彩，着力最为扎实。梳理南京历史，文献多多，卷帙茫茫。贺云翱从南京的史前文化到该区域成为吴文化重地，从秦汉边地到六朝都会，并非拾人牙慧，陈陈相因。他提出冶城并非源自吴王夫差，而是孙吴开篇。他说秦始皇的确路经南京，但命名秣陵，没有根据。东汉时期的中水侯李忠，披荆斩棘，功不可没。南京的隋唐寂寞，杨吴、南唐的再度崛起，令人唏嘘。宋元时期的区域中心，大明的开业之地，他征引了陈山毓的《南北论》，颇有眼力。对于朱明在南京开基立业，贺云翱就朱元璋的政治黑暗，引用赵翼评价其“残忍千古所未有”，振聋发聩。对南京的天京岁月，还有

1949年到1953年这段历史，许多著作或者故意回避熟视无睹，或者敷衍潦草匆匆而过，但贺云翱都予以重视，娓娓道来，殊为难得。

“空间篇”，视野开阔，仪态万千，跳出南京看南京，既有国际视野的鸟瞰，又有古都体系的比较，既有中国所谓四大文化区的考察，又有南京历代区域变迁的审视，最终落脚到对于南京都市圈的讨论，极具现实意义。贺云翱在这一篇章中征引了史念海先生的观点，也提出了南京并非短命王朝亡国之都的看法，甚至对南京的所谓伤今怀古之于伤感这样的刻板印象，他也提到了刘士林教授的观察。贺云翱经过考察比较，不仅就南京作为都城的时间长短进行辨析，还把南京与西安、洛阳等古都相比较，郑重提出南京也是千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位移的独特城市。

有了“时间篇”“空间篇”的着意铺垫，再来讨论南京的文化个性、地位、使命、遗产，就避免了凌空蹈虚高头讲章，就有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内在逻辑支撑。贺云翱不管是纵论南京的文化个性也好，文化地位也罢，抑或探讨南京的文化使命，都是按照古代、近代、当代的时间脉络，大开大合，高屋建瓴。他提到了帝王州与佳丽地的关系，条分缕析在这座城市帝王文化、士文化、市井文化之间的此消彼长，提到了学衡派对南京学术的影响，说了张之洞的历史作用，也提到了与南京现代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缪荃孙、张謇、李瑞清三位先贤。就南京的文化遗产，贺云翱把它归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又细分为建筑遗产、器物遗产、文献遗产、思想遗产、教育遗产、文学遗产、书画遗产，而南京的云锦织造、刻经印刷、剪纸、白局、灯会，甚至板鸭、盐水鸭制作工艺等，也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南京：历史与趋势》是作者《文化江苏：历史与趋势》的姊妹篇，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地域文化研究的用心力作。

雷雨